

学人随笔丛书

且去填词



来新夏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且去填词

来新夏 著

学人随笔丛书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且去填词/来新夏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504-832-0

I. 且... II. 来...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853 号

且 去 填 词

来新夏/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恒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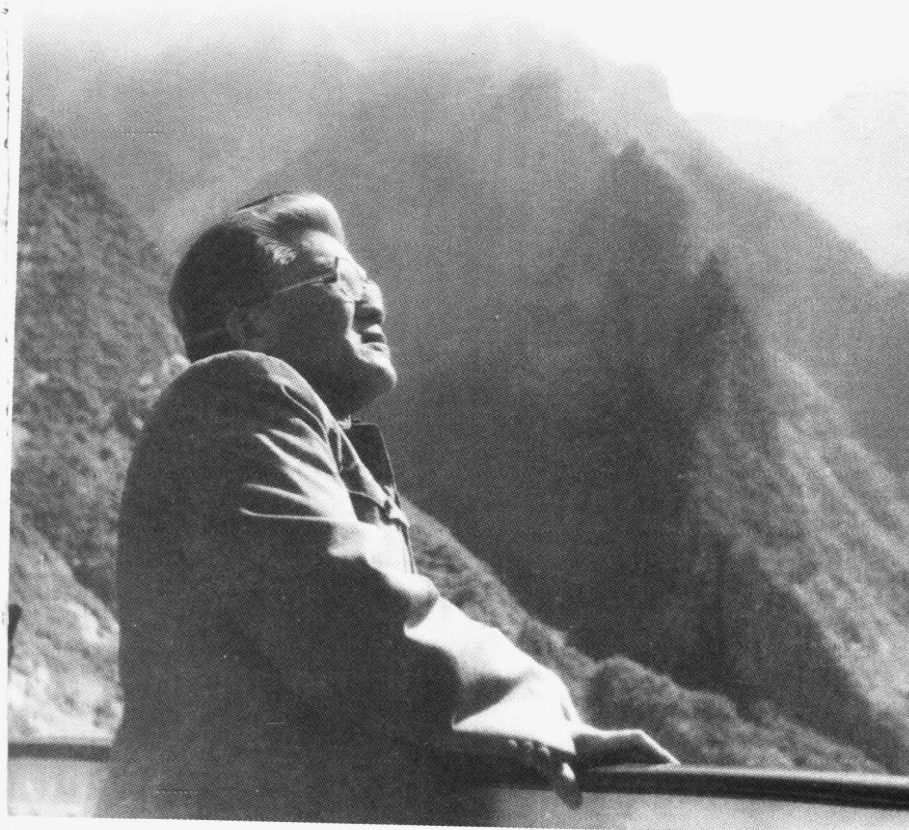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82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04-832-0

I·181 定价:14.80 元



作者近照

“且去填词”

——代序

养病期间，难遣永昼，偶从架上抽《苕溪渔隐丛话》一册，翻得严有翼《艺苑雌黄》中有记宋词人柳永逸事一则，其文曰：

柳三变喜作小词，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这段记述中的柳三变是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的初名。柳永字耆卿，曾官屯田员外郎，是北宋仁宗时拥有大量读者与歌者的词作者。宋叶梦得在所著《避暑录话》中记他任官于丹徒时，曾遇见一位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是可见柳词流传之广。其中“上曰”的“上”是指宋仁宗。在宋人的著作中，记仁宗这件事的有多处，有的只是说法略异，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说：

仁宗留意风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如果剔去仁宗那些一本正经的种种借口和撰述者那些阿谀皇帝的藻饰美词外，无论是“且去填词”，还是“且去浅斟低唱”都有值得作为史鉴的地方。一个“薄于操行”而在填词创作上已有成就的员外郎（比附为处级），即使仁宗能够“明扬仄陋”，把柳永不次擢升为郎中（比附为局级）、侍郎（比附为副部级），也许只是个毫无政绩的“花花官”，而仁宗却能看中柳永的长处，扬长避短，让柳永“且去填词”，无意中造就了一代词人。纵使柳永未能入传《宋史》，但他创作的大量作品，确为后世留下重要的文学遗产。他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雨霖铃）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等名句，一直脍炙人口，为人传诵。柳永虽然正史无传，但南宋以来各种文学评论著作无不给予颇高的评价，甚至有“杜诗”、“柳词”之并称，而且评价越来越高，清末民初的词家郑文焯即评说：“屯田（柳永官屯田员外郎，故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做挥绰之声”（《大鹤山人词论》）。近代以来，各种文学史、词史、诗史无不以相当篇幅涉及柳词。这就是宋仁宗之所以为宋仁宗，知人善任，尽其所能，为有宋一代文苑增添异彩，开拓了宋代文学主流——宋词的广阔天地。

“且去填词”已说过去近千年,但是它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史鉴的作用。不过,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对人才的“且去填词”,确非易事。文革过后,平反纠错,落实政策,可谓是一次不错的重才举措,但是有人认为还要为之找顶乌纱帽带上才算“真正的落实”。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在指挥着对人才的使用。有一位拥有男女老少广大读者群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他的作品不仅有纸书,还有影视片,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柳永的“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真是“凡有人聚处,都在说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与其社会职能如何等问题不是我的学养所能议论;但是,金庸小说无论从数量和技巧水平看,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领域中的大师级人物,并能进而独领这一领域的“风骚”。可不知为什么偏偏要在“武侠小说大师”的桂冠上,又重重地加上一顶某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乌纱帽,总揽院务,无疑会少写多少部武侠小说,有碍于大师的更上层楼。另有一位中国最年轻的郑院士,在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高科技领域中极有成就,但偏偏让他坐上西北某大学副校长的交椅,分管人事和外事。类此之例,不在少数。不久前,在报上看到一篇《“重才”不等于戴“乌纱”》的短文,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的用人导向,也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确是警策之语,而且更是对专业人员从事专业权利的剥夺。如把“乌纱帽”戴到适合戴和想戴的人的头上,而让金大侠“且去写武侠小说”!郑院士“且去造机器人”!让各种卓有成就的人才都“且去”这个,“且去”那个!两全其美,各得其所,岂不懿欤盛哉!

作者 小传

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天堂杭州。幼承家教,诵读三、百、千、千。长入教会学堂毕业于辅仁大学。专攻历史,差三零四地读过些经史子集。年未及冠,捉笔为文;不到而立,竟登讲坛。育才不少,诲人?误人?任人评说。著述廿余种,论文近百篇,大多爬梳抄纂之作,聊充铺路石子。安身立命南开大学半世纪,由助教历阶至教授,起起落落,未见寸进。十年牛棚苦,练身好筋骨。学农津郊,躬耕四年,成书三种^[1],不亦快哉!人当退休之年,我方出山问世。作吏十年^[2],似烟若云。岁登古稀,休致回家。衰年变法,寄情随笔,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阅世读书,得小集七种^[3],又不亦快哉!于世无忤,与人格格,胸满暗箭疤痕,背有插刀创伤。无怨无悔,还我坦荡。年近八旬,余热犹在。八宝之路尚遥^[4],电脑敲打不辍,更不亦快哉!只

要早晨起床，依然天天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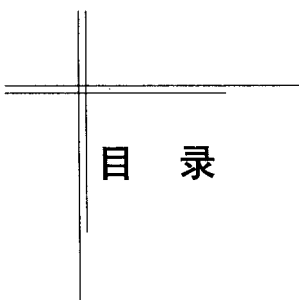
【注】

[1]下放津南北大港地区四年，利用晚间耕余，整理恢复“文革”时被焚抄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林则徐年谱》，又新撰《目录学浅说》一稿。

[2]我于前一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意料之外地曾荣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实职工作。

[3]小书七种是：《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塞谷谈往》、《枫林唱晚》、《一苇争流》和《来新夏书话》等。

[4]借八宝山公墓之喻。



目 录

“且去填词”——代序·····	1
-----------------	---

作者小传·····	1
-----------	---

卷一

漫说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	1
--------------------	---

中国图书文化的历史价值·····	8
------------------	---

中国古代的编辑事业·····	25
----------------	----

开辟北京地方文献新史源·····	28
------------------	----

藏书·读书·治学·····	34
---------------	----

世纪之交的沉思·····	42
--------------	----

新世纪的修志思考·····	45
---------------	----

我也谈谈随笔·····	51
-------------	----

关于“长江文化”的议论·····	61
------------------	----

敦煌百年三笔账·····	65
--------------	----

校园文化·····	69
-----------	----

面的采风·····	72
-----------	----

我好想“考博”哟·····	75
---------------	----

卷二

书生论·····	80
求免“入典”·····	84
官箴·····	88
官大就是学问长·····	92
市声·····	95
署名三叹·····	100
赠书史话·····	103
灯下挑眼续篇·····	106
儒商与商儒·····	109
炎凉冷暖·····	113
冠军的背后·····	116
笑得想哭·····	119
葛剑雄,好样的·····	123
兴建天津邮政博物馆刍议·····	127

卷三

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	131
乾嘉史学三家·····	139
召唤饮冰室·····	142
一代儒僧李叔同·····	145
重读《陈垣史源学杂文》·····	152
学人逸闻·····	158
戒烟的故事·····	165
老成凋谢·····	169
怀穆旦·····	174
悼纬堂·····	179
齐藤——走好!·····	182

衰年变法·····	185
卷四	
关于“书话”的话·····	189
《明代孤本方志选》序言·····	193
流入学的脚步·····	196
漫话《津门杂记》·····	200
读《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205
选读点清文·····	209
读《弢翁藏书年谱》·····	213
一本装满人间冷暖的专著·····	217
阐幽发微 功在儒林·····	222
读《仕宦箴规百种》点校稿·····	225
缩万卷为一图·····	228
一部当代的新图经·····	231
坐收利便于几席之间·····	235
卷五	
议论文化游记·····	239
过港行·····	243
中华文化浸润的澳门·····	247
台湾博物馆·····	254
吐鲁番纪行·····	257
平遥古城·····	264
娘子关揽胜·····	268
积水潭忆旧·····	272
UBC 的亚洲图书馆·····	276
后记 ·····	279



漫说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

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确有着某些显著变化。于是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有积极作用。我不完全同意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我没有读过几本海外史学理论的书,可以说不懂海外的史学理论,因此,我只就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论文而理解到的一些研究方法,简略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任何事务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有些当时看好,但过段时间也许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感到有足堪回味的内涵,例如对海外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时,对一切新鲜的东西,包括没有看到过的海外中国近代史著作都以羡慕仰望的态度来接受,而忽略了选择;但

是到了九十年代就不同了,有了批判精神,对海外的东西不是一味接受,而是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这就是一种进步。我对待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态度和出发点,也就是如此。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学术交往日多,比较容易接触到海外学者和资料,看到过去不可能看到或很少看到的港台地区以及美、日、加和欧洲等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遂使中国近代史学者大开眼界。这是能够了解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必要前提,从而才有可能让我们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其方法,并逐渐能选择对我们有所启示和值得吸取的地方。因为这个论题比较大,难以进行全面完整地论述,我只想举几个例证来说明我的粗浅看法。

史源是研究历史者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清代乾嘉史家在利用官书、正史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版和谱牒等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陈垣等都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与开发,梁启超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正续编中,都很着重扩大史源的问题。陈垣先生甚至明确标举“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并以之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但是,近几十年,这一优良传统被破坏,由于屡屡地批判“唯史料论”,随意乱贴正确理论的标签,好做放言高论,“出思想”成为某些人不亲自动手做学问的时髦流行语汇。于是奉行者照方抓药,随意抓几条现成的史料,填充成文,几已成为习惯性动作,致使史学研究领域飘荡着一股空疏学风,史源开拓很少有人问津。而海外若干学术机构却建立了有关中国学术的这样那样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协

会等等来搜集资料,开辟新史源。九十年代前后,我在国外看到这一现象,颇多感触,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所搜集、收藏的“红卫兵”小报,比较丰富完备,应当说这是研究“文革”历史的重要史源库;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口述资料库,我曾去查阅过北洋人物的口述资料,虽然有些需要甄选考订,但终不失为研究近现代人物的重要史源,《顾维钧回忆录》就是根据其所藏顾氏口述资料翻译而来的,唐德刚教授撰写李宗仁、胡适的传记也曾以此为重要史源之一。纽约州有个规模不大的大学图书馆集中全力收藏了越战资料,成为研究越战的一大史源。有些海外学者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某一专题,不惜远涉重洋,到中国来寻求史源,美国宾州大学讲座教授林蔚为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直奉战争,几次来中国访求口碑与文字资料,与中国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学者交谈商榷。另有一位一时想不起名字的美国学者,为了研究罗隆基的一生,辗转托人向中国政协机构、民盟组织和有关人士挖掘史源,也要求我为他提供史源线索。日本有位年轻的天津近代史学者贵志俊彦专门研究近代天津史。他曾多次来津查档案,经常泡档案馆搜求史源,并与有关人士接触,尽量扩大史源线索,天津有许多近代史学者接待过他。海外学术机构和学者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者曾产生一种无形的影响。我在美国曾遇到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章开沅教授,他当时仆仆于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大学之间,积极搜求他所研究的“在华教会学校”课题的史源。海外学者的这种重视史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虽有所影响,但不能不说中国确实有过这样一种传统,只不过中断或淡化了一段时间,所以这种影响正如

民间所说的是一种“出口转内销”而已。

海外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很注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启动某一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要搜集有关此课题的大量资料以了解当时该课题已达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潜研于档案馆之类的原始史料集中地,以一二年的时间广泛搜集与考订,加以诠释而采用入文,将这一课题向更高层次推进,有所新发现,提出新论点。有一位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陈志让为了研究军阀的定义时,曾经征引了薛立顿、费正清、陶希圣、王造时、梁漱溟、戴季陶、蒋介石、胡汉民、林伯克和章有义等中外军人、政客和学者的说法。另有一本《剑桥中华民国史》,全书 1033 页,其中引用书目达 55 页,占全书总页数的 5.3%,又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书 707 页,引用书目达 110 页,竟占了 15% 强。这样,研究者自然掌握了该课题的既有水平,而对史料的运用也就游刃有余了。其实,过去中国的学者也都采用这一方法。我们读过乾嘉史学家的一些著作中往往也概括前人的成果。甚至某些著名的札记、小录对极细微的问题也追本溯源;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许多论文在起首处也常有《问题的提出》或《缘起》之类的题目,介绍前人的成果,以引发下文。六十年代以后,这种著述方式才逐渐消失,于是,一些作者并不认真查阅文献,便昌言无忌,即使重复了前人的论点,也可以用“暗合”之词自解而泰然处之。随手从他人水桶中倒水而敷衍成文,颇有伤于良好的学风。因此,海外学者那种重视前人成果和深入搜集资料的研究方法是应当加以重新吸取的。最近中国史学界似乎对此有所醒悟,它表现在中国七种史学方面的代表性刊物的编辑部正式发出《关于遵守

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三条，开宗明义第一条作了如下的规定：

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我们七刊将不予受理。

义正词严，话说的很硬，但很好。不如此，不足以振聋发聩。也许他们是针砭时弊，也许他们受海外研究方法的启示。我看他们的大声疾呼是在唤醒我们的史学研究要好好地继承传统的实证态度和马列主义要求详细占有材料的信条。

近年来，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颇受青睐，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有相当数量被翻译介绍进来，他们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多喜由近及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成果比中华民国多，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比研究晚清史热。这种详今略古的研究趋势正在越来越强。最近，著名学者戴逸教授在应《中华读书报》读者就“文史哲：‘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一题采访时说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条说得很好，他说：“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新中国史上。”戴逸教授的预测决非只是单一的由于海外的影响，因为他在四点意见的第一条就申明，他认为新世纪的历史学“必须吸收中国传统和外国史学中间的优良部分，作为营养，作为借鉴”。他所说的应是努力的方向。